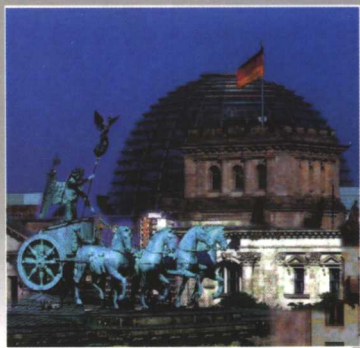


连玉如 著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

「新德国问题」探索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Reihe Deutschlandstudien
Peking Universität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 外交政策

——“新德国问题”探索

连玉如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连玉如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

ISBN 7-301-05886-1

I. 新… II. 连… III. 对外政策-研究-德国
IV. D8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628 号

书 名: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

著作责任者: 连玉如 著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886-1/D·0656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zy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高新特激光照排中心 6263762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7.875 印张 415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连玉如 1954年生于北京。1982年2月和1984年8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文学学士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1995年1月获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

1996年从德国回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任教，从事国际关系、西欧与德国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任历届中国德国研究会理事，受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中国西欧政策的决定因素——80年代中国对德关系》（德文版）。1996年回国以后主要就中国对外关系、欧洲特别是德国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书评、专题述评、国际观察、学术访问报告等数十篇。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出现的“新德国问题”，对统一德国在变化了的国际关系中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原则和操作两个层次、历史和现今两个时期、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观点和看法，譬如关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改变与‘连续性’的坚持并行不悖”的问题，关于“德国奉行的是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以及“德国既是‘迟到的民族国家’，同时又是‘超前的民族国家’”的问题，等等。本书涉及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对于从事德国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序 一

——为连玉如教授《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一书而作

建交以后 30 年德中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是良好的经济交往推动了两国关系持续发展；德国是中国当今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质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关系领域，而且还反映在中国总理朱镕基和德国联邦总理盖尔哈特·施罗德 1999 年共同倡导的法治国家对话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参加“9·11”以后国际反恐联盟，已使中国愈来愈承担起其应有的国际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连玉如教授向中国读者推出一部研究德国外交政策——当然是从中国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著作，尤其令人欣喜。该书不仅深入分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建立直到今天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而且还进一步阐释了即使在国家统一以后德国仍大力坚持其原有外交政策。纳入欧洲架构是二战结束以后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在何去何从问题上做出的根本决策，它已经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乃至 21 世纪指导德国外交政策继续发展的恒定因素。

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指导方针已经写进德国“基本法”序言。据此，德国的政策必须致力于三大目标：第一，维护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这一德国统一目标已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成功实现，因而已从宪法中取消）；第二，以平等的伙

伴国身份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行动；第三，为世界和平服务。这些规范即使在“2+4 条约”签订和生效、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的对外主权以后依然有效。有鉴于此，即使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德国“基本法”在其最为重要的第一条以及它在自由问题方面做出的价值规范，仍然是德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目标取向。

同欧洲联盟以及其他区域中心和组织一样，中国将是 21 世纪世界多边秩序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心。当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而非能否——保障建立在平等权利和同等地位基础之上的世界多边秩序。决定 21 世纪世界发展进程的因素是：有关各方是否都能致力于全球合作、宽以待人和在不同文明之间实行对话；是否都能理智地看到，只有以所有各方的利益为政策取向，才能最好地体现所有各方的利益。惟有平等合作、而非寻求优势，才能避免世界罹受全球争斗之难甚或陷入全球或区域对抗的危险境地。

因此，将德国与中国之间开展交流与友好合作视作亦是在为建构这种稳定秩序添砖加瓦，就更为重要了。作者呈现出来的这部论著已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是一部成功之作。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
前联邦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Geleitwort

von Bundesminister a. D. Hans-Dietrich Genscher
für die Veröffentlichung von Frau Prof. Yu - ru Lian

*Neue Weltpolitik und deutsche Außenpolitik —
Nach einer Lösung der "Neuen Deutschen Frage"*

Rund 30 Jahre nach Aufnahme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ist das deutsch-chinesische Verhältnis heute von einer besonderen Qualität gekennzeichnet. Dabei sind es vor allem die gut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die zur Kontinuität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Ländern beitragen. Deutschland ist heute Chinas wichtigster europäischer Handelspartner. Die Qualität der Beziehungen wird jedoch nicht nur in den ökonomischen Beziehungen deutlich, sondern auch in dem seit 1999 vom chine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hu Rongji und dem deutschen 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gemeinsam initiierten Rechtsstaatsdialog. Durch den Beitritt zur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und die Teilnahme an der Internationalen Anti-Terrorallianz nach dem 11. September wird China zunehmend seiner internationalen Verantwortung gerecht.

Umso erfreulicher ist es daher, dass mit der Unter-

suchung von Frau Prof. Yu-ru Lian nun ein Werk vorliegt, das auch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der chinesischen Leserschaft — natürlich aus chinesischer Sicht — näher bringt. Das Buch ist mehr als eine einge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seit der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Es zeigt, dass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auch nach der Vereinigung des Landes von großer Kontinuität geprägt ist. Die Einbettung in den europäischen Rahmen ist eine der wesentlichen Richtungsentscheidungen der jungen Bundesrepublik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ie wurde zur wegweisenden Konstant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ährend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und darüber hinaus.

Diese Richtschnur für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st verankert in der Präambel des deutschen Grundgesetzes. Sie verpflichtet die deutsche Politik erstens zur Wahrung der nationalen und staatlichen Einheit — eine Vorgabe, die mit der Herstellung der deutschen Einheit am 3. Oktober 1990 erfüllt und seither nicht mehr in der Verfassung enthalten ist. Zweitens legt sie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darauf fest, als gleichberechtigtes Mitglied in einem vereinten Europa zu handeln und schließlich drittens, dem Frieden in der Welt zu dienen. Diese Vorgaben gelten auch nach dem Abschluß und der Ratifizierung des Zwei-plus-Vier-Vertrages, durch den die volle äußere Souveränität der Bundesrepublik hergestellt wurde. Deshalb orientiert sich Deutschland in seiner innen- wie außenpolitischen Ausrichtung auch in einer neuen multipolaren Weltordnung an der Wertevorgabe, wie sie das deutsche Grundgesetz mit dem alles überragenden Artikel 1

und seinem Postulat der Freiheitsfrage formuliert.

China wird zusammen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anderen regionalen Zentren und Zusammenschlüssen ein wichtiges Kraftzentrum der multipolaren Weltordnung im 21. Jahrhundert sein. Es geht heute um die Frage, wie — und nicht ob — eine multipolare, auf Gleichberechtigung und Ebenbürtigkeit gegründete Weltordnung gesichert werden kann. Der Verlauf des 21. Jahrhunderts wird davon abhängen, ob alle Beteiligten zu globaler Kooperation, zu Toleranz und zum Dialog der Kulturen bereit sind und ob sie sich von der Einsicht leiten lassen, dass den Interessen aller am besten entsprochen wird, wenn die Politik sich auch an den Interessen aller orientiert. Nur gleichberechtigte und ebenbürtige Kooperation anstelle von Vorherrschaft vermeidet die Gefahren globaler Rivalitätspolitik oder gar globaler oder regionaler Konfrontation.

Es ist daher umso wichtiger, dass der Austausch und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auch als Beitrag zur Schaffung einer solchen Stabilitätsordnung gesehen wird. Mit der vorliegenden Untersuchung ist der Autorin ein Werk gelungen, das zu diesem Ziel einen außerordentlichen Beitrag leistet.

Herrn Dr. Müller

序 二

在15年前,即1987年5月,我曾为连玉如女士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时编写的教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写了前言,向对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推荐那本书。我指出,那本书“是一个很勇敢和很辛苦的尝试”,当时“在国内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且整理成书,还是第一次”。“作者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学者,在联邦德国进修期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回国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开了这门课。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鼓励的。”“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因而这本书的出版肯定会受到欢迎和注意。”

时光飞逝,连玉如女士已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攻读了博士学位,学业完成后又回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在对德国和西欧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继续做出了很多的成绩。2002年底,她又给我送来了这一部有4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我看了后非常高兴,这不仅反映了她这些年来来的刻苦努力,而且这个题目正是在世界发生大变化后人们所十分关注和研讨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这15年中,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甚至全世界,

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1989年第四季度,东德和东欧的政局发生剧变,原来的政权纷纷垮台。到1990年3月,东德的5个州集体加入西德,从而德国在战后经历了41年分裂后重新实现统一。东欧各国也先后成立新的政权,修改宪法,改变国号。在战后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了40年的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完全瓦解。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激化,在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之后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到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降落下来,宣告了经历了70年风雨历程的苏联的完全解体。从而,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局势开始走上了多极化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大变化的面前,人们当然对新的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未来的走向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对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疑问,要求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中,统一德国今后的走向当然是其中之一。德国统一后,面积为37.5万平方公里,人口7800万,1990年统一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人们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自然而然地要问。德国重新统一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政策,还是重蹈历史上曾给世界特别是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

连玉如女士这些年来紧紧抓住了这个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特别是欧洲国际关系中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进行了如本书题目所说的“新德国问题探索”。她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包括德国的历史、社会,战后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了较为完整和详尽的研究后

认为,“统一的德国将会继续实施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会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因为德国1949年以后开始实施的西方一体化不仅成功实现,而且得到巩固。”她还认为,“西方化,包括价值认同、政治制度取向、战略结盟关系等各方面,是对‘德意志特殊道路’历史传统的背离,它在二战以后西德的发展获得了成功。德国重新统一没有根本动摇迄今为止实行的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统一的德国依旧是欧盟、北约等西方一体化组织的可靠成员。”“因此,德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极为关注,其大国作用的设计和发挥也是以此作为主导。”我虽然对德国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基本上同意她的这个结论。

在德国统一之后,专家学者们已发表了很多有关德国今后走向的文章,结论是很相似的。但整理成书,在国内可能还是第一次,作者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当然,对德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国的研究还有待于更深入和广泛的探索,我相信这本书将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 殊

中德友协会长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中国驻联邦德国前大使

目 录

序一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序二	王殊

导 论	(1)
第一节 德国问题的解决与“新德国问题”的提出	(2)
第二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	(6)
第三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平等目标	(13)
第四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克制文化”	(17)
第五节 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理论探索	(22)
第六节 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决定因素	(42)

第一部分 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制度

第一章 德国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55)
第一节 德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根本原则	(55)
第二节 德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演变与发展	(61)
第三节 西德政党制度稳定的原因	(76)
第四节 德国统一以后政党制度的演进	(78)

第五节	德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87)
第二章	德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92)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基本类型	(92)
第二节	德国议会制度的特点	(97)
第三节	德国行政权的特点	(103)
第四节	德国司法权的特点	(106)
第五节	德国联邦制度的特点	(110)
第三章	德国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	
——	德国的“宪法冲突”问题	(115)
第一节	德国宪法的“分权规范”	(115)
第二节	德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	(118)
第三节	德国“宪法冲突”的政治文化层面	(120)
第四节	新分权方案	(124)
第四章	德国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	
——	德国的“宪法监督冲突”问题	(129)
第一节	德国的“宪法监督冲突”与司法自律	(130)
第二节	德国宪法监督的百年历史回顾	(134)
第三节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监督职权 国际比较	(136)
第四节	德国的“宪法监督冲突”与政治自律	(142)
第五节	欧洲地区宪法法院的欧洲化	(146)

第二部分 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

——“波恩共和国”外交政策(1949—1989年)

第五章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理论与评价	(154)
第一节	阿登纳二战以后在德国政坛上的崛起	(155)
第二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理论主张的产生与苏、美、英、法 对德政策	(159)

第三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理论主张	(166)
第四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评价标准	(173)
第五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评价之一 ——德国对法国政策	(177)
第六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评价之二 ——德国统一政策	(181)
第七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评价之三 ——德国对美国政策	(187)
第六章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践	(192)
第一节	引言	(192)
第二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	(194)
第三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之一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成	(199)
第四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之二 ——“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	(204)
第五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之三 ——“伦敦—巴黎协定”的生效	(208)
第六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之四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的建成	(212)
第七节	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之五 ——“欧洲政治联盟”的失败和“德法合作条约” 的签订	(218)
第七章	两个德国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230)
第一节	阿登纳政府的德国政策与 1952 年东西方之间 “照会战”	(231)
第二节	阿登纳政府的德国政策与“哈尔斯坦主义”	(237)
第三节	艾哈德政府时期和基辛格政府时期的 德国政策	(249)

第四节	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	(260)
第五节	勃兰特政府的“新德国政策”	(276)
第六节	80年代两个德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及其决定性因素	(286)
第七节	两个德国关系发展的限度	(298)
第八章	德苏关系发展对德美关系和德法关系的 影响	(301)
第一节	德苏关系改善与苏联外交政策“新思维”	(301)
第二节	西德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新思维”的 积极评价	(304)
第三节	西德对苏外交决策的党派基础	(307)
第四节	德苏关系发展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312)
第五节	德苏关系发展对德法关系的影响	(334)
第六节	德苏关系的发展限度	(341)
第三部分：西方一体化的巩固		
——“柏林共和国”外交政策(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以后)		
第九章	新世界政治格局与统一德国大国作用	(349)
第一节	德国统一的实现	(349)
第二节	新世界政治结构与相互依存	(353)
第三节	统一德国地位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359)
第四节	统一德国的大国作用	(361)
第十章	统一德国外交决策的演变与发展	
——德国联邦议院欧委会在德国外交决策 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二战以后西欧一体化事业的发展	(370)
第二节	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委会的历史背景	(379)
第三节	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委会的法律基础	(381)